

一群蛀虫“腐败共赢”,百亿国企“巨额减值”

安徽徽商集团“内控式腐败”窝案,警示“用人行政化、作风衙门化、监管空洞化”的国企“三化”亟须针对性治理

本报记者徐海涛、汪奥娜

徽商是中国商业史上的著名品牌。在当代中国,有一家国有大型企业居徽商地,冠徽商名,5年前还号称年营业收入600多亿元,将冲击“千亿徽商”,如今却陷入亏损,年收入剧降至不足50亿元。这就是安徽徽商集团。

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国企的首要职责,徽商集团为何短时间内如此“巨额减值”?《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其中有市场波动的因素,但根本原因是原董事长许家贵、原纪委书记张皓为首的管理层“内控式腐败”。他们无视风险、虚增业绩,疯狂寻租,其中仅许家贵一人就造成国有资产损失19.8亿元,使一块国资“金字招牌”几近被掏空。内部贪腐成风,对外却极尽粉饰,使“腐败肿瘤”难以暴露,越长越大直至失控。

徽商集团窝案引起安徽省委高度重视,全面整改行动随之启动。目前,徽商集团在新的管理团队带领下艰难自救,持续下滑的态势得到遏制,提出了今年扭亏为盈的目标。但在令人痛心的国资流失背后,暴露出一些国企“用人行政化、作风衙门化、监管空洞化”等典型问题,仍值得深思。

合作方个个赚得盆满钵满,唯独国企债台高筑

近期,徽商集团旗下的安徽徽商之都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韩贻坤因犯受贿、行贿、国有公司人员失职、为亲友非法牟利“四宗罪”,被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至此,徽商集团腐败窝案主要涉案人员均已被法办。

徽商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许家贵和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张皓,均因犯受贿、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于今年初分别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4年、10年零6个月。

此前,还有徽商集团原总经理助理、徽商金属公司董事长刘勇、徽商集团下辖的徽商城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胡耀、徽商创元装饰工程公司原董事长张兵及总经理朱建军……徽商集团有近二十名中高级管理人员落马,涉及多个子公司负责人以及29名民营企业老板。

国企高管与民企老板“组团出事”,这种大规模贪腐窝案并不多见。纵观该案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国企管理人员与民营企业老板深度勾结、里应外合、损公肥私。

徽商集团在合肥东开发区有一块1000多亩的土地,董事长许家贵主导与民营企业老板范某合作,以徽商集团出地、范某公司出资方式,共建批发市场。范某承诺分期付给许家贵500万元“好处费”,并送给具体负责项目的徽商城董事长胡耀60万元,使这个项目有了两份内外不同的“阴阳协议”。徽商集团对上级报备的项目收益分为5比5,对内则实际按照2比8分成,范某实得大头,并借机坐支、截留、挪用项目收入数亿元,留给徽商集团的却是巨大的投资风险。

徽商集团持有34%股权的徽商创元公司,开发的多个房地产项目存在违规招投标、提前支付工程款、向个人高息借款等问题。但由于该公司负责人向许家贵、张皓行贿,集团公司不仅不查处,反而为其提供大量的土地、资金和担保。创元公司开发房地产项目失败,徽商集团承担连带责任多个账号被查封,股权、土地被冻结,涉及金额巨大。

许家贵收受安徽某投资公司董事余某350万元,为其取得徽商集团池州住宅项目的合作开发权提供帮助。收受江苏徐州某铸造公司负责人金某100余万元财物,为其提供帮助,使其从徽商金属公司套走3.4亿元。

“合作方个个赚得盆满钵满,唯独国企债台高筑。”一位办案人员痛心地总结。

领导带头当“硕鼠”,带坏了徽商集团的风气,



管理层从上到下几乎“能贪尽贪”。就连一名驾驶员也通过给民金融资4000万元过程中“拉皮条”,一笔就“提成”66.7万元。

谎报业绩胡乱作为,“千亿徽商”口号成泡影

徽商集团在20世纪90年代由安徽省物资局等改制、重组而来,是国家重点、省域龙头商业企业,旗下拥有中高档的商之都百货、面向大众的红府超市、面向“三农”的农发农资等多个知名商业品牌。发展到2010年时,集团已有16家购物中心、800多家超市、20家电器连锁店、1670家农农资连锁店,堪称一艘国有“商业巨轮”。

2010年,徽商集团以营业收入343.8亿元位列中国企业500强188位。董事长许家贵提出打造“千亿徽商”,力争到2015年经营规模突破1000亿元,成为“千亿级别的现代流通航母”。

但是,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并没有从市场实际出发,而是采取行政工作分解的方式,集团总部简单地将销售额年均增长20%以上作为业绩考核目标。各子公司为完成任务,有的偏离主业盲目拓展业务,有的编造数字谎报业绩,八仙过海,乱象丛生。

作为集团的核心业务板块之一,徽商金属公司曾是安徽省实力最雄厚、专业性最强的股份制流通企业,为了“五年规模翻五倍”,竟然放弃传统的钢材购销业务,投入到风险极高的虚假融资性贸易中。2012年至2014年间,虚假融资性贸易业务规模达136亿元,形成近27亿元欠款难以收回,公司资不抵债。

徽商农发公司以经营农资为主,却贸然进入房地产领域开发了多个项目,终因业务不熟、管理不善全部亏本,并造成大量矛盾纠纷。商之都不计成本盲目扩张,导致多个新开门店连年亏损。

越亏越借,越借越亏,徽商集团陷入恶性循环,内部长期运行两本账,虚构业绩骗取贷款成为惯用手法。2014年末集团净资产只有9.22亿元,报送银行的数字却达32.48亿元。

徽商集团的经营状态持续恶化,经审计到2016年7月底,集团净资产为负12亿元,仅两家子公司账面微利,多数资不抵债。短短几年间,“千亿徽商”口号成泡影,一家大型国企几近被掏空。

“内控式腐败”侵蚀“国企大树”

徽商集团“内疾”如此严重,为何外部长期未发现?据记者调查,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内控式腐败”。现代管理学有一个名词叫“内部人控制”,是指现代企业中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不一致,导致经营者控制公司,股东难以对其有效监督从而利益受损的现象。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国企管理者腐败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在徽商集团窝案中,“内部人控制”问题进一步升级为“内控式腐败”。由于管理层贪腐成风,最终形成了上下沆瀣一气、共同贪腐的局面,人人参与、各取所需、相互包庇,目标从“腐败平衡”到“腐败共赢”。

二是内外监督失灵。董事长许家贵担心监督别人引爆自身的“炸弹”,见了问题绕着走。纪委书记张皓自身不正、腰杆不硬,担心“拔出萝卜带出泥”,对审计、督查发现的问题不敢动真碰硬,对信访核查大多“暂不处理,仅作组织掌握”。集团纪委十年未查一起案件,甚至将反映商之都公司董事长韩贻坤问题的举报信直接转回该公司,最终落人举报人之手。

上级国资管理部门当时的监督管理体制不健全,对徽商集团偏离主业、有章不循等问题未能及时发现制止。监事会职能作用发挥不够,事前管控和事中监督乏力,对集团违规超净资产红线担保、超持股比例担保等问题,未能及时叫停严责追责。

内部贪腐成风,外部风平浪静。就这样,徽商集团出现问题近十年,却几乎没有举报,“暗腐败”将这棵“国企大树”侵蚀得千疮百孔。

董事长只为“多捞钱”,“四风”盛行坏国企生态

腐败必从破纪始。记者了解到,徽商集团许家贵这一批腐败分子,始于初心不正、作风腐化。

许家贵曾长期在省、市党政机关工作,54岁时从安徽省亳州市常务副市长岗位调任徽商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他坦言,来徽商集团之前已经当了12年的副厅级干部,自感在仕途上已经走到顶峰,不可能有什么发展了,“那无非就在企业多拿一些钱”。

党的十八大之后,徽商集团对中央八项规定

部分企业财务造假,一些中介机构未勤勉尽责、审计失败。包括康得新在内,近年来,万福生科、欣泰电气等企业接连发生财务舞弊案。众华、利安达、立信、瑞华、大华等会计师事务所,屡次受到监管部门处罚。“一桩桩丑闻的背后,几乎都存在审计失败的问题,一定程度影响投资者的市场信心。”宏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洪斌说。

评估有失公允,执业程序“走过场”。2017年,

中联资产评估对九好集团的“忽悠式重组”给出虚假评估报告,被证监会“没一罚五”顶格处罚。2018年,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接到浙江证监局行政处

置若罔闻,“四风”问题突出。集团总部长期以领导机关自居,行政色彩浓厚,许家贵、张皓等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严重,习惯在办公室指揮调度,下基层也只是走马观花。

多名徽商集团员工表示,当时的公司更像是一个衙门而非市场主体,集团每月召开的经营调度会,完全以听汇报“走过场”方式进行,子公司都报喜不报忧,到处是“创新”“亮点”,对问题避而不谈、视而不见。

许家贵热衷于喊口号、唱高调、搞粉饰,好大喜功、虚增业绩。在他任上,徽商集团公布的营业收入连年提高,数字逐步迈上300亿元、400亿元、500亿元台阶,到他退休的2014年,徽商集团号称实现营业收入616亿元,名列中国企业500强201位。

但《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徽商集团向外公布的业绩存在很大水分,2014年的实际营业收入只有107.6亿元,且亏损2.9亿元。随着许家贵在任时积累的问题集中爆发,到了2016年,徽商集团营业收入暴跌至44.4亿元,亏损扩大至3.9亿元。

“许家贵爱搞政绩,集团在全国500强中的排名上移,他就觉得脸上有光,还可以多拿奖金。”徽商集团原总经理助理刘勇说。

徽商集团窝案爆发后,查出一系列作风问题。集团各子公司招待费长期居高不下,仅徽商金属公司每年就达数百万元,超标接待、铺张浪费司空见惯。

办案人员介绍,许家贵经常借考察之名公款旅游,伙同一些公司管理人员工作时间饮酒、打牌、打球。经查,其中仅上班时间经常陪他打乒乓球的员工就有4人。他曾组织一帮人编撰书籍《徽商之道》,专程赶到黄山、大别山等地“润稿”,出版后自己署名。

徽商集团政治生态恶化,内部用人问题突出,裙带关系、近亲繁殖严重。2012年集团53名后备干部中只有2名一线职工,73名中层以上干部中有18人的近亲属在集团任职。许家贵将儿媳提拔为人力资源中心副经理,张皓违规干预让民主投票仅排名第6的人选“上位”。劣币驱除良币,几年里徽商集团累计离职1000余人,人才流失造成重大损失。

企业的状况让很多员工感到揪心和愤慨。“我当年能分配到这么好的单位工作,心里非常自豪非常高兴。”一位在徽商集团工作近30年的老员工说,从来没想到集团会有一天变成这个样子,内心非常痛苦和焦虑。

腐败高发的背后:党组织形同虚设

2017年底,安徽省委巡视发现徽商集团的腐败问题,并进行了严肃查处。以许家贵、张皓为首的贪腐分子被立案审查,开除党籍公职,没收违法所得,移送司法处理。其中许家贵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300万元;对其已退还的赃款赃物予以没收,其他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张皓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零6个月,并处罚金80万元。

安徽省委剖析认为,徽商集团腐败窝案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宽松软。据了解,在许家贵任董事长、党委书记期间,徽商集团党委长期借口讲业务不讲政治,长期不抓党建,党组织不健全,集团内部党组织班子曾缺员20多人,6个支部书记长期空缺,党的领导作用和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几近丧失。多年没有正常的组织生活,集团党委中心组学习曾一年只有两次。

根据安徽省委部署,安徽省国资委党委以徽商集团窝案作为主要反面教材,在全省国资系统开展“讲忠诚、严纪律、立政德”专题教育。

刮骨疗伤、消除沉疴,在持续数年的震荡后,徽商集团在新一任领导班子带领下艰难求生存,加强党建、稳定局面、清欠挽损、恢复经营。

2018年,徽商集团经营状况明显改观,亏损大幅减少,实现营业收入44.5亿元,增长2%。13家直属(控股)公司中有徽商期货、徽商化轻等5家实现盈利,徽商金属等4家公司减亏。

“集团持续下滑的态势得到遏制,生存问题基本解决,但发展仍很艰难。”徽商集团新任董事长潘友华表示。

据了解,徽商集团当前仍面临资金缺口、人才缺口、员工安置等难题。集团党委在《致全体员工的一封信》中号召,知耻后勇推动集团重生。

对国企腐败“三化”需针对性治理

用人行政化、作风衙门化、监管空洞化——据了解,徽商集团腐败窝案中暴露出的三大突出问题,在近年来的国企腐败案中具有一定普遍性。

比如用人行政化问题,国企成了一些党政干部仕途的最后一站,调任国企担任领导仅因“级别合适”而非事业需要,有的不具备专业能力,有的带着“失落感”和养老心态,有的抱着“最后捞点钱”的不良动机,给国有资产带来重大风险或损失。

除了许家贵,还有近期被控受贿1500多万元的安徽省能源集团原董事长白泰平,坦言自己57岁时从安徽省政协秘书长岗位调到企业任职,总想着还有3年退休,最后捞一把。安徽出版集团原董事长王亚非,为了给自己退休后的事业“铺路”,大肆利用国企的各种资源为自己的“小圈子”和共同利益谋利,受贿403万余元、挪用公款510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90万元。

有的国企长期处于近似于“监管真空”的状态,如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孟庄煤矿,原矿长许家贵经常借考察之名公款旅游,伙同一些公司管理人员工作时间饮酒、打牌、打球。经查,其中仅上班时间经常陪他打乒乓球的员工就有4人。他曾组织一帮人编撰书籍《徽商之道》,专程赶到黄山、大别山等地“润稿”,出版后自己署名。

国有资产是全国人民的共有财富。专家认为,要遏制腐败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有资产做强做优做大”的国企改革发展目标,根本出路是依靠党的领导,完善纪检监察体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企的“根”和“魂”,必须在国企改革中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任务,强化企业党组织的主体责任。

安徽省委党校教授张彪认为,非垄断型国企身处市场竞争中,需要高级专业经营人才。让“仕途无望”的机关干部进入国企领导岗位,要么没有专业能力或兴趣,要么想在退休前“捞一把”,这样的照顾性安排会使国有资产面临巨大风险。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认为,国企在选人用人上基本仍是按照党政机关的等级授职制,层层任命产生,在“生存法则”的作用下,任命者与被任命者容易“抱团”,导致决策、执行、监督三权重叠,权力过于集中滋生腐败。

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锦表示,同时不少企业的监事会与外部审计常常是“蜻蜓点水”“走形式”,在“三重一大”事项监督、完善内控体系、外部治理等方面难以发挥应有作用。此外部分国企的信息公开不充分,使社会公众监督难以实现。

帮康得新虚增百亿利润,“看门人”沦为“放风者”

康得新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案中,部分中介机构迎合委托人需要,执业程序“走过场”

本报记者孙飞、印朋

近期,康得新公司涉嫌虚增利润119亿元引起广泛关注,康得新的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已被证监会立案调查。部分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本应是资本市场“看门人”,却沦为“放风者”,中介机构如何尽责归位?

虚增119亿元利润,3年审计“无保留意见”

本周,年报涉嫌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的康得新公司(*ST康得)股票停牌。根据监管部门认定的事实,公司4年时间里虚增利润总额达119亿元,连续4年净利润实际为负,相关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可能被强制退市。

监管部门已关注到康得新涉嫌信息披露违法案的中介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已经被立案调查。

记者了解到,瑞华会计师事务所自2015年提供审计服务,近4年审计费用共计840万元,其中,2015、2016、2017年报的审计结果均为

“标准的无保留意见”,但这3年康得新分别虚增利润23.81亿元、30.89亿元、39.74亿元。2018年,瑞华对康得年报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结果。

一位审计从业人员介绍,“标准的无保留意见”是会计师通过执行了规范的审计程序后认为企业财务报表是公允的,如果企业被查出财务造假,会计师将负有责任;“无法表示意见”则意味着会计师无法保证年报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记者调查发现,2015年至2018年,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共有5名会计师担任康得新公司年度报告的签字会计师。其中,江晓、王支健在2018年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李海林、江晓、邱志强、郑龙兴在2015年至2017年出具“标准的无保留意见”,其中郑龙兴的工作地点在广东深圳。

记者11日来到位于深圳市益田路太平金融大厦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该所工作人员称,郑龙兴近日未在办公室出现。

部分中介机构乱象频出,“看门人”沦为“放风者”

罚,成为首家被证监会派出机构处罚的评估机构。一位业内人士表示,部分中介机构的审计评估程序存在缺陷,审计评估过程迎合委托人需要,执业程序“走过场”,审计评估项目复核流于形式。

合规意识薄弱、片面追求业务规模,行业一定程度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一位会计师事务所从业人员表示,面对来自大公司的业务,中介机构不愿意轻易放弃,为了争夺客户,行业独立性越来越弱。与此同时,违法成本也不算太高,导致一些事务所对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视而不见”。